

文学与艺术

# 浅析日本民族性格

## ——读《菊与刀》

谢丽霞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菊与刀》是二战临近结束时本尼迪克特为美国政府写的一份有关日本的报告。这是一本反映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的人类学文化著作, 本尼迪克特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亦即双重性, 由此来研究它形成的重要因素。本文从人类学、民俗学视角来解读《菊与刀》的文化内涵和日本民族性格, 对我们正确认识当今日本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菊与刀; 双重性; 文化内涵; 民族性格

**[中图分类号]** 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053(2011)05-0147-03

### 一、《菊与刀》产生的背景

众所周知,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者著作, 而是一份在特殊背景下为美国政府制定对日政策提供研究的报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美国亟需制定战后对德、日的政策。由于美国对日本不太了解, 政府资助并动员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 以便制定出战后对日本的政策, 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孕育的。

由于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 本尼迪克特本人当时不可能到日本去进行实地调查。所以, 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 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 同时凭借到过日本的西方人写的游记及其他书籍和日本文学作品和电影来进行她的研究。

本尼迪克特认为, 文化就是“大写的个性”, 她注重从整体上研究一种文化的特性, 还强调: 每一种文化都有主旋律(一般来讲, 主旋律就是“民族精神”)。使文化具有一定模式或具有区别于其他文化特点的正是该文化的主旋律。她的《菊与刀》恰恰是对日本民族双重性格的文化层面的探索 and 解析。她在文中写到:

“只有高度注意一个民族生活中的人类日常琐事, 才能充分理解人类学家这一论证前提的重大意义: 即任何原始部落或任何最先进的文明民族中, 人类的行为都是从日常生活中学来的。不论其行为或意见是如何奇怪, 一个人的感觉和思维方式总是与他的经验有联系……人正是在日常细节中学习的。”<sup>[1]</sup>

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在东方文化生活过的西方人, 作为一名一直对欧洲中心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进行反思与批评, 强调文化的模塑性的人类学学者, 本尼迪克特在研究中准确地把握了东西方文化中的细微差异, 并把这种影响对民族气质的形成以及这种民族气质会对战争带来的影响做出了精辟的论述。正是因为本尼迪克特相信孤立的细小行为之间有系统性的联系, 才正确地给出了美国政府所需要的答案。

### 二、“菊与刀”: 日本民族双重性格的符号意义

本尼迪克特具有深刻精锐的观察力和慎思敏捷的感悟

力,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学者, 她从人性的角度, 从文化、制度的层面深入剖析了日本民族的整体性格。

“刀与菊, 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好斗而又非常温和; 黠武而又爱美; 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 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 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 忠贞而又易于叛变; 勇敢而又懦弱; 保守而又敢于欢迎新的生活方式。”<sup>[2]</sup>

在本尼迪克特看来, 日本是个具有双重性格的民族, 它具有柔美如菊的一面, 可醉心于菊花栽培; 又具有黠武好斗的一面, 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日本人认同等级观念和极度夸大精神力量在视公平为原则和宣扬物质的西方文化中是无法理解的。本尼迪克特在文中也反复地强调: 日本人相信精神能战胜一切, 嘲笑战争中采取的一切安全措施, 认为那是懦弱的表现。作者认为这种异常矛盾的民族特性, 贯穿了日本的整个文化。如同题目所写, 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 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 这两种充满强烈对比的符号组合在一起, 成为日本独特的文化气质, 即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该民族人们的脾气真让人难以琢磨透。正是由于日本人的这些性格特征, 约束并引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才使日本这样一个区区小国有胆实、敢顽强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期间, 面对美国强大的国力, 日本政府推行精神优越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原原本本地应用于战争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们的战术小手册中有一句口号: “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 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sup>[3]</sup>日本人还经常说: “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 这次战争没有为他们增加多少资源, 而我们有!”由此, 我们就不难理解, 为何一个小小岛国, 在资源贫乏的条件下, 凭借它特有的“日本精神”, 竟能如此大动干戈地发动战争。

但二战失败后, 一旦天皇宣布投降, 日本人马上采取完全合作的态度。因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 “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 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 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sup>[4]</sup>对所有日本人来说, 天皇就是一切。所有的日本军

[收稿日期] 2010-12-03

[作者简介] 谢丽霞 (1978-), 女,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民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人,也都是“皇军”,是天皇的部属,是神的选民,天皇的命令,就是神的指令,所有日本人就必须无条件的忠诚服从。作者本尼迪克特正是从日本人对待天皇的态度入手,通过明治维新以来天皇与武士关系的变化来解剖日本统治思想的演进,从而对美国政府最为神经质的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

三、断层的教育与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双重性格的原因初探

在《菊与刀》这部作品中,作者本尼迪克特以一个人人类学家的能力,向大众从文化的角度揭示了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重点探讨了日本社会的基础、日本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维持关系的主要要素和日本人人格形成的童年经验。

关于日本社会结构或日本文化的基础,本尼迪克特认为是等级制度。日本是个讲究等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处于最高效忠地位的就是天皇。等级制得以延续主要是日本人明白自己的位置,强调“各安其分,各得其所”,不但自己如此,要求他人也应这样。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日本这个民族认为每个人都应忠诚于自己的上级,同时心安理得地享受自己等级内的特权,即使是最低等的贱民,如果安分守己,不做越级之事,也同样是值得尊重的。她在文章中写到:

“日本人在构筑世界秩序时,经常考虑到等级制。在家庭以及人际关系中,年龄、辈分、性别、阶级决定着适当的行为。在政治、宗教、军队、产业等各个领域,都有十分周到的等级划分,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一旦逾越其特权范围,必将受到惩罚。只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得以维持,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他们就会感到安全。”<sup>[5]</sup>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等级制观念,日本人认为: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因此应该由他们来引领世界,站在世界等级中的顶端。因此,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民族毫无顾虑地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正确地论述了日本的社会结构主要是基于人身依附或统治服从的关系,维持这种关系的观念是“报恩”意识,或者讲是靠“恩”的道德伦理来规范人的行为。她在文中讲到日本人对“恩”的理解:

“‘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但在日本,‘报恩’被看作与‘恩’全然不同的另一个范畴。……对日本人来讲,称之为‘恩’,一经接受,则是永久常存的债务;‘报恩’则是积极的,紧如张弦,刻不容缓的偿还,是用另一系列概念来表达的。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懿行。为报恩而积极献身之时就是行有美德之始。”<sup>[6]</sup>

如果有人出手帮了一个日本人,从此这个日本人就欠了此人的恩情,日后一定要偿还。所以日本人从不轻易施恩于人,也不愿受恩于人。如果你帮助了一个日本人,你别想得到他诚心诚意的感激,那深深的鞠躬礼的背后是他内心的怨恨,因为你让他背负了向你报恩的义务。因此,本尼迪克特在文中反复强调:“菊”与“刀”代表了日本民族文化的互悖共存的文化意象,也代表了日本大和民族的双重性格,日本人以负恩和复仇两种极端的方式来化解道德上的压力。

日本人对名誉的捍卫似乎有可以衍生出其忠贞的心性,因为他们对天皇有绝对的忠诚,所以为了“天皇的旨意”,他们愿意绝对遵守甚至献身,而这一点恰好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从而能够号召官兵誓死为天皇而战。

在《菊与刀》中,最具心理学色彩的应当是儿童早期经验的分析了。本尼迪克特研究了日本儿童的养育习俗,以此来说明日本人格的特征。正是这些养育习俗使日本的人生观具有矛盾性,即两面性,且每一面都不容忽视。在育儿方式上,日本与欧美可谓是大相径庭。本尼迪克特在文中指出:

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一

根很大的浅底U字型曲线,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像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sup>[7]</sup>

可见,日本人在幼儿期,是父辈们手中的宝,可以无拘无束、公开表达自己的冲动,同时在家庭这个核心中,潜移默化地学习等级制的习惯。当入学几年后,他们才真正被纳入成年人那种谨慎的生活模式,开始训练、学习“对名分的情义”,并服从其规范。青年期以后,日本人就会主动地在其生活的领域担负全部的义务还自觉自愿地为“尽忠”、“尽孝”而死。他们的道德的一个主要信条是:克制才能使自我更有价值。正是这种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才使日本人形成双重性格,既可以沉浸于安逸享乐的生活中间,也可以不计一切去承受极端的义务。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的自我负责的意识,使他们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本尼迪克特还指出,在对不同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中,分清以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或以罪恶感为基调的文化是一项重要研究。罪恶感文化是以道德作用为绝对标准,依靠启发社会成员良知的文化;耻辱感文化靠外部的约束力来约束,而不像罪恶感文化那样靠内心的反省来做善行。在《菊与刀》中作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sup>[8]</sup>。耻辱感在日本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甚至被日本人纳入他们的道德体系,它使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所以,日本人对于恩惠和侮辱的感受是刻骨铭心的,可谓“睚眦必报”。他们爱惜名分,履行对自己名分的其他多种义务。因而,对于别人的诽谤和侮辱进行或者选择报复,或者选择自杀,其他的非极端做法恐怕都难以淡然处之。二战后,日本人在历史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民族健忘症”和悔罪意识淡薄,可以从这种缺乏恒定的是非标准和他律性道德的“耻感文化”中获得合理的解释。

#### 四、不同的思考:评日本民族的双重性格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反映经济基础并受经济基础的制约。但本尼迪克特认为文化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各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历史形成的特点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金克木先生说: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sup>[9]</sup>。菊花的优美与刀的杀戮象征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正是破解这一谜团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力著。

如众所知,日本是一个坚守保守主义的民族,但它又是一个好学的民族,在古代封建社会,日本人向富足强盛的中国学习。它虽然从中国引进儒家伦理中关于“忠”和“孝”的观念,但却极为鄙视被儒家视为最高准则的“仁”,还不断强化它的等级制观念。因此,“忠”和“孝”成为他们伦理中最主要的两极,从而使其民族文化的二元性根深蒂固。进入近代工业社会,他们又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发展经济、军事,日益强大起来,却依然坚持其等级制观念,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各安其分”的日本道德观,并指望其他国家接受。日本人依靠精神维护着顽强的传统,这种顽强其自认为是意志品质的培养,而忽视的是对于传统正确与否的修正,从而使日本人性格的双重性造成种种紧张。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日本人马上认识到,只有发展经济才可引领世界。今天的日本,其产品充斥于世界各地,已越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可见,日本人这种认定一个道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的。

尤其是,近年来,在中日关系中出现了很多复杂的问题。作为一名中国人,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们依然

首先要搞清楚的,今天的日本人在如何思考,日本人将如何行动。我们应站在中国的立场观察日本,同时学会换位思考,借鉴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战后60多年来日本社会发展演进的历史进行综合认识。只有知己知彼,在处理中国与日本的国际事务时,中国才能与日本人化干戈为玉帛,达到双赢的目的,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 注释

- [1]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
- [2]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
- [3]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7
- [4]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2
- [5]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

(上接第146页)民间的观众选择的是适合民间情怀的表达方式。”<sup>[15]</sup>强烈的娱乐性为二人转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受众群体。

“深入到那个所有人都置身其中的生命模式里,这种生命模式赋予人类生存以共同的节律”,<sup>[16]</sup>这样的二人转才能真正拨动人的心弦,给人带来生命的快乐。

近年来二人转的火爆是俗文艺对主流娱乐方式的一种反讽,体现了大众文化对主流话语和精英意识的冲击。它满足的是“尚俗”、“尚性”的大众审美趣味,而非关注整个社会、对人的精神发展有诸多诉求的知识精英的审美需求;它实现的是俗文艺对人类的日常关怀,而非雅文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当曾经通身闪烁着真理之光、教导社会范导价值的精英文化日薄西山之时,作为俗文艺的二人转正以经济指标高扬着世俗的旗帜打压着传统艺术文化领域,让囊中羞涩的艺术也无地自容。<sup>[17]</sup>这种人为的矫情,迎合媚俗的情趣,不是一句“走向文化市场”所能解释的,<sup>[18]</sup>虽然满足了大众的审美趣味,更多体现的是物质欲求。◇

#### 注释

- [1] 杨朴.《二人转与东北民俗》[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
- [2] 吴文科.《二人转:当代中国审美风尚的一个支点》[J].艺术评论,2004:11
- [3]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
- [4] 《著名作家谈二人转》[N].黑龙江日报,2005:127
- [5] 《四作家来哈谈二人转》[N].黑龙江日报,2006:221
- [6] 杨朴.《二人转与东北民俗》[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
- [7] 马金萍.《老调重谈》[J].《戏剧文学》,1998:8
- [8] 《二人转说口汇编》[M].吉林省艺术研究室编,1984年版
- [9] 同上

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66

- [6]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80
- [7]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176
- [8]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ii
- [9]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iii

#### 参考文献

- 1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 2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张燕,傅铿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 3 (春秋)孔丘.孝经[M].陈书凯编译.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一然]

- [10] 吴世彩.《大众文化的和谐价值》[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2第6页
- [11] 刘毓崧.《古谣谚序》[M].
- [12] 王红箫.《同地异天:二人转的嬗变——二人转现状的深层分析》[J].文艺争鸣,2007:11
- [13] 杨朴.《二人转与东北民俗》[M].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
- [14] 刘雅静.《浅议“二人转”》[N].辽源日报,2006:223
- [15] 田子馥.《东北二人转审美描述》[M].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2007:9
- [16]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22页
- [17] 刘雅静.《浅议“二人转”》[N].辽源日报,2006:223
- [18] 蔡体良.《漫议“二人转”》[N].文艺报,2004:710

#### 参考文献

- 1 《二人转:当代中国审美风尚的一个支点》[J].吴文科.艺术评论,2004:11
- 2 《二人转与东北民俗》[M].杨朴.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1
- 3 《中国俗文学史》[M].郑振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
- 4 《老调重谈》[J].马金萍.戏剧文学,1998:8
- 5 《二人转说口汇编》[M].吉林省艺术研究室编,1984年版
- 6 《大众文化的和谐价值》[M].吴世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12
- 7 《古谣谚序》[M].刘毓崧
- 8 《同地异天:二人转的嬗变——二人转现状的深层分析》[J].王红箫.文艺争鸣,2007:11
- 9 《东北二人转审美描述》[M].田子馥.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2007:9
- 10 《心理学与文学》[M].荣格.三联书店1989年版

[责任编辑:李丹]